打工诗歌，三亿打工人的时代印记

——见证“新市民”的文学家园

本报记者 周倩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大量内地务工人员涌入南方沿海城市，形成了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打工潮”。一代乡村青年放弃世代相袭的谋生方式，走进城市，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生存的艰辛、苦难，心理上的落寞，与外界的隔阂……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书写打工生活的真实诉求，“打工文学”初露端倪。

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一批“打工文学”作者的优秀作品经过《佛山文艺》等期刊推出，引起打工群体的广泛关注，影响了一代打工人，但这些直面现实的优秀文本及写作者未能进入主流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沉淀，一些打工写作者坚守在诗歌的阵地，并逐渐创作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精品佳作。

本世纪初，在广东惠州的西湖，承载千百万打工者心灵诉求的《打工诗人》报应运而生，一大批颇具实力的打工写作者在此汇聚，通过《打工诗人》这个平台，作品开始在全国各大媒体亮相——《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以及《诗刊》等主流媒体或专业诗刊，相继介绍和推出“打工诗歌”。

40年来，打工诗歌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主流诗歌创作群体所接纳。著名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杨牧这样评价：“打工诗歌拥有诗歌最重要的元素——真，他们的诗歌来自平民、来自底层、来自生活，他们不是坐在屋子里面写生活，而是本身就泡在生活里。打工诗歌是纯天然的文学形态，没有任何添加剂。”

工厂流水线日复一日的轮转、城市里的漂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许强、柳冬妩、李明亮、唐以洪、张守刚等，作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的第一代打工诗人，他们是这一切的承受者、目击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诗歌在亲历疼痛、唤起千万打工者的共鸣之后，继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向。诗歌，于他们，是自身打工岁月的情感寄托，是思索，甚而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打工者们早已把城市当成第二故乡。当有人还在为他们衣衫不整、歪头沉睡的形象所不屑的时候，却不曾想在工地上汗流浃背的他们，早已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在中国上亿的打工者群体中，写诗的人不过寥寥数人。然而，社会需要读到这样的诗歌，因为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新市民”。或许，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得更近，让生活更融洽，让社会更和谐。

本版漫画：赵春青

火车上的蛇皮袋子

张守刚

那么多蛇皮袋子
被两条铁轨鞭子一样
赶在一起
穿越大地的腹心

躺在行李架上的
带着满身疲惫进入了梦乡
挤在过道里的
还在半梦半醒之间
蜷在座位下的
刚刚才钻进去
摇摇晃晃中
他们要通向工业区
去追赶命运的车轮

喜欢

李明亮

那些离大地近的
熏染着泥土气息的事物
都是我所喜欢的

无论是苍翠的植被或低矮的云朵
还是羸弱的枯草或淌着冰凌的河水
无论是辛劳的走兽鸟雀或游鱼蛇虫
还是扑面而来的飞蛾或耳边的一声惊雷

只要它们终究会落回到地面上安家
哪怕和一轮满月的倒影擦身而过
我就没有理由不喜欢它们

故乡

唐以洪

只是在烙铁停顿的那一秒
我想了想
然后继续用烙铁
把一天烙得嗤嗤地
冒成一股烟

只是砰的一声躺在床上时
我想了想
来不及回味，就像一粒枣
被黑夜咽下

对于明天
我也这样停顿一下烙铁
只想了想

只是一粒锡渣
飞溅在心窝里的一触即逝的疼痛

注：
①许强在深圳的出租屋
②民间诗报《打工诗人》
③柳冬妩去广东打工的车票
④唐以洪在烟盒上写的诗

劳动者最有力的大合唱

许强（第一批打工诗人、打工诗歌主要推动者之一）

1989

①

今天早上一位失去联系的高中同学，通过微信联系到我。他要感谢我1996年在深圳对他的资助，记忆像一个时光摄像机一下把我拉回在深圳打工的经历。

人的一生有许多地点，让我们刻骨铭心。一想起深圳万丰村的门牌，我心中说不出是爱、是痛、是悲伤，还是夹杂着一丝温暖的苦涩回忆。谁也无法想到，这个出租屋与我以后写作的打工诗歌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些储存在一个人心中的厚重苦涩，发酵着或渲染着打工诗歌的色彩。

1995年我来到深圳。眼前呈现的一切落差，让人晕眩。因为没办暂住证，头晚到深圳，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治安队员抓走，还好表姐花50元钱，把我保出来了。那时办个暂住证得200多元，哪来办证的钱？

大学毕业后，我又来到了深圳。由于学的是会计专业，工厂都是招聘女生，重点是不会粤语，工作不太好找。整天四处逃避治安员的“逮捕”，跟巡逻队玩起了“躲猫猫”。每次出门前，我总得条件反射地探头四处张望。身无分文的我每天早出晚归，顶着烈日当空的高温，为找工作而终日奔波。同年除夕，我一贫如洗，用煤油炉熬稀粥，刚煮个半熟就没煤油了，摸摸口袋，身无分文。看着别人杀鸡宰鱼，我透过小巷的空隙仰望苍穹，一种无端的悲凉涌上心头。

在空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我一气呵成写下《在深圳流浪的日子》：“走在坚硬的粤语中 我们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我们被冻僵的表情只有靠依偎的乡音取暖”“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粒，多像/母亲的泪水/是什么卡住了我/隐藏在我的喉咙间/鱼刺一样/使我无法驱赶”……

对于正在经受挫败的打工者来说，诗歌无疑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最终决定，为打工群体的命运鼓劲和呐喊！

我用敏锐的触觉，捕捉千万打工者的拼搏，坚韧的刻刀在朽木上飞速行走，一首《铁钉》深深扎进了人们心里，犹如成千上万根钢针，刺中无数脆弱的心灵。“要拔出多少内心的痛，才能凑足一斤铁钉/要从身上拔出多少汗水，才能凑足一日三餐/一根根铁钉能走多远，一根根铁钉用民工的汗水和血泪解渴/铁钉，是生锈的哑巴 ，泪往心里流。 ”

无需华丽的措辞，也不必过多的夸张和比喻。我以一颗有着感同身受之心与工友们彼此慰藉、彼此激励，我常想：“我不能保持沉默，要用我的诗记录这个时代打工族的生存处境，呈现打工一族的内心呐喊。”

2001年，我与几位朋友创办了后来著名的民间诗报《打工诗人》，把全国各地的打工诗人汇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同时，编辑出版《中国打工诗歌精选》选本，主办中国打工诗歌奖。我们在努力为三亿群体留下自己宝贵的文化财富和鲜活的时代记忆！2003年我从广东到苏州，并选择了在苏州定居。

打工诗歌来源于打工现场深处，它有砂纸粗砺的真实之美。它的写作主流是打工个体最真实的情感释放，任何一种文字，只要是完整的表达或呈现个体的内心世界，它对个体而言就是最美的。因为它充分地释放了个体内心的情感，使个体得到了充分的燃烧，充分地燃烧就是一种最耀眼的完美！

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壤催生了打工现象的出现，打工群体像潮水淹没了中国的所有城镇，像钢筋水泥一样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打工诗人就是那个扛着水泥深情歌唱的人。有了打工诗人，才会有打工诗歌。在改革开放中，劳动创造了打工诗人，打工诗人创作出了打工诗歌。这是劳动者之歌，这是底层人民之歌，这是世界劳工最有力的大合唱！

漂泊是我诗歌创作的最初动力

张守刚（第一批打工诗人）

1993

②

我的打工生活从1989年的湖北瓦庙开始。那年在砖厂，我用板车拉湿砖胚，活不重，且好长时间才轮到我拉一车。我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离我们砖厂不远有一个书摊，专卖旧书、旧杂志。我有空了就往那里跑。卖书的是个老头，他看我常去那里看书不买书，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钱爱读书的外地人，破例将书借给我拿回砖厂看。看的书多了，我就手痒痒地写一些豆腐块了。

湖北那年的雨水特别多，砖厂常常没事做，以致厂里几个月发不了工资，我们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我们又张罗在厂外找零活，来勉强维持生活，好不容易挨到腊月，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卖掉从家里带去的被子作路费，硬着头皮回到了家里。

1990年的内蒙古风好大呀，漫天飞起的沙子，打得我睁不开眼，捂住脸，隔了一层布，脸还是被沙打得生痛。从乌达新区到乌达煤矿要翻过两座山，这条路，我熟悉得闭着眼睛就能走。山下有家书店，我常常下班后到那里去，就是那家书店，支撑着我在暗无天日的煤井里干了一年。

井里的活脏、累，一天下井虽然只有八小时，潜伏的危险时时威胁着我们，常常听到瓦斯爆炸或煤气中毒致人死亡的消息。每天从井里出来满身的煤灰包裹得我们没有人样。

1993年3月，父亲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做冲压工。就是在那里，我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93年5月14日。

那一天我加夜班，在冲床上操作切边的过程中，因冲床失去控制，切掉了我左手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看着血淋淋的手，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在长达四小时的手术中，我咬紧牙关，强忍住痛。看着医生用钢锯割去多余的骨头，身边照顾我的工友被这残酷的现实吓得相继晕倒。

住在病房里，我整天除了看书，就是睡觉，有时还唱歌。每天都有很多人陪着我，他们陪我笑、陪我唱，虽然失去了指头是痛苦的，我还活着，我总是对他们说：“活着就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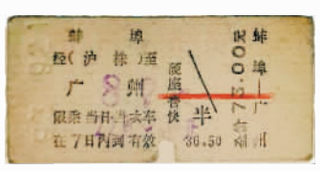
1994年5月，在长长的见工队伍中，我被选进了坦洲镇南洲皮革厂做一名普通工人，之后又做了保安。做保安是很空闲的，每天值班八个小时，我便有很多时间看书、写东西了。我那时没有想到文学之类的东西，只想让自己空余时间有所寄托，没想到我的一篇文章在《佛山文艺》变成铅字了。在这之后，我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2000年6月，我的第一本诗集《工卡上的日历》出版，在打工群体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的打工诗歌创作由原先的内心宣泄或者心灵寄托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只要有务工的存在，打工诗歌会永远存在。

2007年至今，我在家乡云阳县城培训学生阅读写作。这些年来，我一直本着脚踏实地、埋头实干的态度，得到了家长们及社会的认可，在云阳有相当不错的口碑。这十多年来，虽然艰辛，但也算平稳。周末给孩子们上课，平时批改作文、看书、写作、行走。虽然身在家乡，依然是那些漂泊的姿势。毕竟，漂泊是我诗歌创作的最初动力。

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自己

柳冬妩（第一批打工诗人、打工诗歌评论者）

2001


③

1993年夏天，我在上海嘉定县打工，一个阴雨天到书店购买了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叶芝的《丽达与天鹅》、蒙塔莱的《生活之恶》等，几部诗集同属于《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1993年9月，我用二姐刘定芳用过的牛仔包，背着这些书独自一人南下广东打工。1991年，二姐与两个表妹曾到东莞大朗镇蔡边工艺厂打工，由此，我写下了第一首打工诗歌《颂诗》。1992年，我高考落榜后到东莞一玩具厂做杂工，年底回乡报名当兵，出发那天，二姐用一个牛仔包帮我打点好行李，和在同厂打工的妹妹、表妹把我送了很远很远。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没有当上兵，也迟迟不敢写信把没有当上兵的事告诉二姐。1993年春节前夕，就在全家为二姐正月初八出嫁准备好嫁妆的时候，在从东莞回家过年途中，二姐与表妹尚红、尚琴因车祸离开人世。那个天寒地冻的春节，我写下了数十首诗歌哀悼她们。

我至今保留着1993年9月那张南下广东的火车票。在大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修过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天长日久，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我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大攻势，我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了。9月的那个深夜，我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下了火车，再坐几个小时汽车便可回到家中，此时，我多么想立即踏上回家的旅途。我捂着还有点疼痛的胃部，归心似箭，但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家，让父母再多一次失望。我提着牛仔包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仍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命运再次把我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天黑时，我茫然地登上了开往蚌埠的列车。最终的结果是，我在蚌埠买到了开往广州的209次火车票。我那候，我是一个被命运驱赶着的盲流，觉得自己就是城市上空飘浮的一颗尘埃，飘飘浮浮，荡来游去，没有着陆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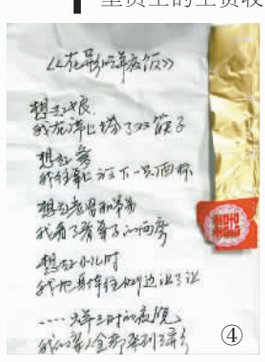
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我来到东莞，开始在一家刺绣厂打工，然后到一家镇报当编辑。1994年4月，我又到了东莞市文联主办的《珠江潮》杂志，当起了“打工编辑”，主持“打工心声”栏目，狂热地写着“打工诗”。1995年第5期的《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据说是《诗刊》首次发表的打工组诗。我的“打工诗歌”几乎与我的打工生活互为印证。

2000年之后，我成了所谓的“打工诗歌评论家”，在《读书》《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几十万字的“打工诗歌”评论，2006年出版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1993年”的一种延续，是90年代写作打工诗歌的一种延续。打工几乎凝聚了我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与情、痛与恨。没有打工，我绝对是另一种意义的艰难和平庸。在这个悖论中，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了自己并证实了自己。

写作是我自己最能做好的事

李明亮（第一批打工诗人）

1999


④

1999年暑假，做了四年乡村教师的我，和三姐一起南下广东深圳，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最开始是在一家生产端子的台资企业做机修工，厂里员工的工资收入大都还不错，但这点不错的薪水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晚上到十一点是常态，零点以后也不是什么稀罕事。除了春节时有三天假以外，没有其他的休息日可以喘一下气。因为工作任务重，休息时间少，有的员工站着开早会时，就像一截木头一样倒了下去。记得在一个难得的调休日下午，我趴在宿舍里，一口气写了近百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因为喜欢写作，神交了几位人在广东、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大约是下半年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带着一个装满书的大背包和一个塞满生活用品的纸箱，辗转来到顺德一个叫碧江的小地方。一个叫老泉的漂泊作家在这里，他准备创办杂志，希望我能帮他忙。

在老泉的鼓励下，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圆珠笔写，有时一天就要写完一根笔芯。在本子上写完草稿修改好后，再工整地誊到方格稿纸上。

我有个小收音机，晚上零点十分，是中央电台文学节目“子夜星河”的开始时间，这个时候我从来都还没睡，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就像年少在老家时听江苏电台的“文艺天地”。我希望自己在一直忙碌的打工路上“空白”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读读书充充电，写作，思考。

2006年末，我应聘进入路桥区的一家五金拆解再生龙头企业。每天骑着车从这座有着“再生金属之都”之称的园区来回的时候，总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拆解工满身满脸油污地用板车拉着堆得高高的被肢解成各种形态的金属块。他们的中餐大多是蹲在路边飞扬的尘土里吃一碗两块钱的面条。

那些打工朋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我最关心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想把我了解的故事用最朴素、最真切的情感写出来。

2011年7月，我受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协办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在社科院的讲台上发表了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专题演讲，题目是：被围观的民工。这个标题来自一个打工者对我说的一件事：他去参加一个活动，被人“弄来弄去的”，感觉就像耍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2009年上半年，我申报的诗集《裸睡的民工》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年度签约项目。能够成为签约作家，对我来说已是荣幸。诗集内容收集了我在深圳、台州等地工作间隙创作的92首诗歌，描摹了当代社会背景下，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作者希望，在低处的向下的生活中，找到向上的路。”这是我在申报这部作品时关于创作构思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就算找不到向上的路，最起码，我的这些文字对当今时代的某一个面作了真实的记录。